

见证日军的暴行

上世纪40年代初，一年大秋后的一天下午三四点，我们麦坡村（唐山玉田县）一群七八岁的孩子，在一块已经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拾粮食。突然，一颗炮弹在我们周围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当时，我们小孩子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懵了，一窝蜂似的到处乱跑。小男孩薛志刚的左手心被炸出一个大口子，满手是血，疼得他用右手托着受伤的左手，弄得两只手都是血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第一

颗炸弹刚爆炸不一会儿，又一发炮弹在我们村后的山顶上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村外来了一队40多人的日军骑兵，他们都骑着高头大马，脚上穿着靴子，身上背着手枪，腰上挎着长长的弯刀，个个都是杀气腾腾、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鬼子进村后，把老百姓都赶到一个大场上训话，由翻译官翻译。鬼子说：“方才我们打炮看错了目标，把小孩子看成了八路军，炸伤了

小孩子是误伤。”天晚了，他没有讲多少话，就和其他鬼子骑着马扬长而去。

鬼子走了以后，一位大叔说：“小鬼子的话纯粹是骗人的鬼话。小孩子人小，八路军是大人。而且，小孩子穿的衣服和八路军穿的衣服也不一样。再说，玉田县城离我们麦坡村不远，最多不过10里地，在城墙上用望远镜观察目标是很清楚的。怎么说是看错了目标炸伤了小孩子呢？这分

明是小鬼子在试炮。他们试验新炮的性能如何，没有目标，就把小孩子当成目标，当成活靶子打，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，真是惨无人道！”

这时，我感到后背直冒凉气。心想，炮弹要是再往前一点儿爆炸，我们这群小孩子都得被炸死，一个也活不成。

几十年来，每当想起这件事，想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，我都要提醒自己：勿忘国耻，珍视和平。 张旭光/文

给儿子取名

因为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“豆腐块”，同学、朋友每有孩子出世，总喜欢找我帮忙取名。时间一长，“名”声在外，我有了“取名专家”的美称。

取名如同作诗，要有灵感。有时，灵光一闪，一个好名字信手拈来；有时思路受堵，一个看似简单的名字却要折腾一番。我给儿子取名，就经历了漫长的“十月怀胎”之苦。

妻子一怀孕，我给孩子的“取名工程”就拉开了战幕。读唐诗、宋词，翻《辞海》《辞源》，可就是想不出一个满意的名字来。妻子说：“你成天帮人家取名，自己的孩子却取不出名字来，真搞笑哟！”

1996年3月3日，儿子呱呱坠地。听到别的新生儿都起好了名字，我的心里一阵内

疚：妻子都生产了，儿子的名字却还“难产”。突然，我的目光定格在挂于病床头的儿子的出生牌上：3月3日。3个“日”3个“月”，不是正好能组合成一个巧妙的名字吗？我心里一阵激动，儿子的名字——“明昌朋”终于诞生了。

“明昌朋”，这个由3个“日”3个“月”组成的名字，寓意着我们平凡的三口之家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既有太阳的温暖，又有月亮的柔情。特别是，儿子的生日3月3日正好藏在名字里，可谓匠心独具，亲朋无不称妙。

时光荏苒，一晃27年过去了，儿子已长成大小伙了，但当年给儿子取名的情景仍记忆犹新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。

明伟方/文

到图书馆借书

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。在老家读小学时，根本不知道还有课外书。到了县城读中学，才看到有的同学在读课外书。于是，我星期天就到县城的书摊儿租阅连环画、小人书，到新华书店看书，平时借学校图书馆的书。

上了大学，借图书馆的书就不像上中学时那样方便了，要自己凭借书证去图书馆借。母校的图书馆，当时的占地面积之大、藏书量之巨，据说只逊于北京图书馆，居全国第二。

入学后，一天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，我步行20多分钟，去了学校图书馆。先凭学生证办借书证，十几分钟就办好了。接着，填借书卡借书，到下班的一个多小时里，

我竟没有借出书来。因为没找到自己要借阅的那本书在哪本目录册上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去图书馆，看有关资料，学习查询图书目录和填写借书卡片的方法，这才借到了书。原来，馆藏书籍太多了，分的种类很细。同名书籍，有中、外多位作者编著的，同一作者的著作，又有不同版本。不同种类图书的目录编制方法也不同，有以书名汉字、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为序排列的，有以作者姓氏拼音字母为序编排的。光是图书目录就好多册，也需要分类查询。熟悉了这些，填卡片才会得心应手。

填好卡片，不用人去藏书室取，传书机会自动将书传送过来。 李维德/文

朝花夕拾

烤白薯

1968年，我们一群年轻人上山下乡，来到唐山市迁安县一个山村。因自然条件所限，人们生活十分贫困。由于粮食产量不足，白薯成为人们一年的主食。

深秋季节，白薯收过之后，总有些未刨干净的白薯还埋在地里，用犁翻耕时就可以翻出来。我们一边翻耕一边捡，待攒下一小堆时，就去找些柴火，把白薯倒在上面，划根火柴点着火，先去干活儿。火烧过以后，那些热灰就把白薯慢慢煨熟了。休息时，我们把烤白薯从热灰中扒出来，已经熟透了。双手掰开烤白薯，一团热气，咬上一口，又甜又香，真是好吃极了！白薯这东西，秋天刚刚刨出来时并不太甜，放一段时间，待白薯中所含的淀粉转化还原成糖分，才会香甜可口。我们说笑着，大口吃着热乎乎的烤白薯，北眺起伏的群山和雄伟的长城，心胸豁然开朗，将所有的苦和累全都忘了。

每年秋天，我都希望去北山坡翻耕白薯地。我们赶着牛车，车上放一只盛白薯用的篓筐，摇着鞭子，悠哉游哉，加上一顿香喷喷、热乎乎的烤白薯，连中午饭都省了。

斗转星移，一晃55年过去了。我已经从当年16岁的少年变成年过古稀的老人。偶尔从街上买块烤白薯尝尝，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烤白薯的滋味了……

阳刚/文

图说价值观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日报社
中国网络电视台

图说往事



全家合影

我的叔伯二哥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入伍的，在部队做后勤工作。1953年6月，二哥回家结婚。当时，我刚1岁多。二哥结婚后，我们全家人特意拍了一张合影。后排右二为二哥，后排左一是二嫂，二排左一是母亲，我坐在母亲的腿上。

郭志辰/文并供图

难忘的关怀

1960年，我被保送到通县（现北京通州）师范读书。我校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学风积极向上，老师们都非常负责任。

新学期开学后不久，我班的一个女生肚子疼得上不了课，请假在宿舍休息。下了晚课后，班主任许老师到宿舍来看她。许老师坐在她的床边，亲切地问：“你是痛经啊？”她说：“不是，俺早绝经了。”许老师一听，非常震惊，问道：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在一旁的几个女生也说：“我们也有好几个月不来月经了。”

那时候，我们也就十七八岁，肯定还没到绝经的年龄。许老师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学校领导。校领导非常重视，第二天一早，便召集各班生活委员开会，要求统计各班有多少女同学不来月经。统计后发现，每个班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。

校领导赶紧商量对策，派人到北京市内的大医院开了中药，用一辆大

马车拉回一大车中草药。校工劈了一垛劈柴，每天早上在校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支上大砂锅熬药，闭经的女同学们每天拿着搪瓷缸来领药喝。喝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同学们的病情都有好转。

那时候我们年纪小，对生理卫生知识不太懂，也没有深想。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太饿，严重营养不良才导致闭经的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学生父母般的关爱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刘晓多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